

《做企业这么多年,我太憋屈了》一文中
涉及的部门

工商 税务 建委 公安 卫生 消防

▲吴海个人微信
公众号头像

很多事情我说了,是因为我知道国家想做好
很多事情我说了,是因为我可能帮助很多人
我是一介草民
历史给了我大声说话的机会
我选择了相信你人性的善良
我选择了相信一切都会慢慢变好

——以上节选自吴海微信公众号wuhai222

回应部门(以时间先后为序)

北京市东城区政协
国务院办公厅
建议吴海将意见整理呈寄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中编办体制改革司
(负责国家行政审批改革)
国务院办公厅信息公开办公室
公安部 税务总局 工商总局
卫生部及北京市相关负责人

本报特约

吴海谈给总理写公开信的前前后后——

每一个声音都有被听到的机会

世上的事真的很难说,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做酒店的生意人,想得也比较简单,努力工作,做得好的话就能多挣些钱,安安静静过自己的小日子。

今年3月23日凌晨,我给李克强总理写了封信放到了网上。没想到,这封信却激起了不小的波澜,李克强总理、汪洋副总理、杨晶国务委员都做了批示,我也因此走进了中南海。

其实,我一直很清楚我只是一个小小人物,对于我个人而言,这一段热闹将会迅速归于平静,一切都会被遗忘。但是,我相信国家的许多进步,都是在许多这样的平静中爆发出来的。

关于给总理的信

其实,我给总理写的信的标题是“对企业好才能对人民好”,这是去年我在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全体代表大会上题为“让市场发挥效率,给企业和政府松绑”的发言的基础上一个完善。

3月22日晚上,我像往常一样看看公司报表,浏览网上新闻,看到网上都在讲总理到工商总局强调简政放权的事。我突然想,这些简政放权说的都是中央部委的事情,而像我这样的绝大部分企业的行政审批和监督管理跟中央部委都沾不上边,这些权力早就下放到地方了,只有地方的简政放权做好了,才能真的帮助到绝大部分企业。

于是我想,我为什么不把我知道的和我的建议说出来?万一国家有关部门看到了可能对促进简政放权还有些帮助呢。当时,我当然没有敢奢望总理会看到我的信。

23日凌晨1点多我开始写,3点多我把建议放到了自己的微信公众号上(wuhai222),于是就有了网上大家看到的那封信。

给总理的信其实我写了两个版本,一个是白话版的信,我放到了网上;一个是正式信件,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把正式信件寄给总理,就存到了电脑里。

大概过了一周多吧,国务院一个机构联系我。我想,是不是我说的话不合适啊?我要被“请喝茶”了?于是我去国务院这个机构,接待我的是一个司长,他大概是看出了我的忐忑,告诉我说,我的信是为国家好,他的领导非常重视,希望我以正式信函的形式寄给他们。我当时想,“他的领导”?他的领导大概就是部长了吧。

于是,我回到办公室把信寄给了接待我的司长,第二天他给我来电话说,“你的信的收件人应该写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收”。哈,领导重视,原来是总理啊!于是我寄了。

因一封致总理的公开信《做企业这么多年,我太憋屈了》,桔子水晶酒店CEO吴海成为公众人物。吴海为什么要写这封信?在中南海,吴海和中央各部委座谈了哪些内容?对于简政放权如何落到实处,吴海又有哪些建议?21日,吴海将给总理致公开信的前前后后,以及两个月来的思考整理成文,授权本报发表。文章大标题为吴海原题,小标题略有改动。



关于中南海座谈会

寄信前后的那段时间,不断有北京市和国家的一些部委和机构的领导约我见面,了解我对职能转变和简政放权的一些想法,我也因此听说和接触了以前没听说的不少负责体制改革的核心部门,估计我这一生能见过的大官也在这几周内全见了。那段时间我在想,我让国家听到企业的呼声的目的达到了,一切都该画上句号了吧。

大概两周前,最早联系我的人给我打电话说国办的领导可能要跟我谈谈,并告诉我国办会通知我时间和地点。我在想,又要见领导了。

5月12日,我接到国办工作人员的电话,他说国办有个会想请我做发言,大概10分钟左右。我问他要不要讲稿,他说不用,让我畅所欲言。

当时我很吃惊,因为我知道很多地方的这类会议都会要求讲稿,并且会有人专门审稿。他提出的唯一建议是便装出席。

我问了一下,便装是不是不打领带就行,他说“行”。

接着,他又问了我的车牌号,说进来要检查,我说好,然后我问会在哪里开呀?他说国办啊。我又问国办在哪里?他说在中南海,从西北门进来。

中南海?当时我确实有点惊喜:我要进中南海了!

5月14日,我开车进了中南海,停车时我在想,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来中南海,本来想拿手机照张相留念,结果被负责警卫的战士制止了。

由于我到得比较早,有时间在楼里到处看一下。这里面的建筑和结构都比较老,就和北京随处可见的一些老部委的楼一样,里面的设施很简单,跟我想象的豪华和气势磅礴差距太大,一些办公室连我在地方见过的处级甚至科级部门办公室的面积和设施都比不上。要不是几个站岗的战士和会议室墙上巨大的屏幕,我都不敢相信自己已经站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心脏区域。

我进会议室的时候,工作人员正在会议桌放参会名牌,我从角落开始找我的名字,最后发现我的名字居然放在长长的会议桌正中间位置。

我当时想,没搞错吧,正中间?我只是一个老百姓。

会议开始后,主持人开始介绍参会人员,我才知道坐在我旁边的是国办领导,桌子对面是国务院一些部委的领导 and 北京市的领导。

会场有点热,不知道是不是中南海严格执行空调摄氏26度的规定,我看领导都穿着衬衣,我就把西服脱了,穿着衬衣。等自己发言结束的时候,我才发现领导们的衬衣袖子都系着扣子,就我撸着袖子。

我被安排第一个发言。我没有讲稿,心想既然说了让我畅所欲言,我就说吧。当时我什么都没想,直接把自己对于地方和基层简政放权、监督管理的担心说出来了,并且把一些改善建议都说了,有的话现在想起来还是比较直接,包括“政令不出中南海”,“处长执政”等话,我也直接说了。

发言的最后,我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可能是官话,可是我还是想说‘下情上达,政通人和,国之幸甚!’”

其实,有时候官话有点道理,至少我说的话国家听到了!

当北京市的相关领导发言时,我插话道:“如果全国都能做到像北京市一样的标准,我就该磕头了。”

老实说,这个会上具体的事我提得很少,更多说的是普遍存在于地方和基层的问题以及简政放权最后一公里解决方案。各部委的回复也比较直接,包括他们

正在做的和计划怎么做的。

会议开了近两个小时,出来的时候我在想,这大概是我这辈子唯一的一次机会进中南海了,可惜连个相片都没留。

车开出去的时候,我心里说了一句:再见,中南海。

我的初衷

是希望从制度上解决这些问题

我在会上提了一些事和一些人做的事,但是我不可能也不会说具体哪个人,哪个城市发生的这些事,因为我的初衷是帮助国家,而不是为难哪个人。

我讲得很直白,八项规定之前有几个不吃喝的,八项规定之后就没有多少人敢了,所以这是一个观念和体制问题,只要行政审批更加严谨、没有弹性解释空间,只要监督管理尤其是罚款能够量化,没有人为裁定,只要对于基层管理制度更到位,这些问题就能解决。再说基层工作本身也不容易,只要他们能改好,我何必为难他们。他们也是有老有小的,社会风气就这样,也不能完全怪他们,因为我选择相信人性的善良。

会后这几天,我第一次没太关注公司的事,媒体来了一拨又一拨。我想,普通老百姓建言获得总理批复算是一个大新闻吧,连焦点访谈我也有机会上了。

不过,媒体总希望有些独特视角,尤其是爆料。虽然我的信确实说了一些问题,但更重要的是我提出了解决方案。不过很多人更感兴趣的是,基层部门变相收取的费用或上缴的“特种税”到底占公司收入多少?我信中提到的某个城市、某些部门系统性腐败指的是哪个城市、哪个部门。每次我都需要解释,我的初衷只是希望从制度上解决这些问题。

国家相关部委也很重视,找我开会了解情况,在涉及具体的人、事和城市时,我选择了沉默。因为我觉得我说的这些人固然有自身的小贪欲,为什么基层领导视而不见?为什么会纵容?有效监督体系的缺失和相关领导纵容才是这些基层小腐败猖獗的最主要原因。

21日上午,公安部的领导专门到公司来开座谈会,地方和基层发生的问题我都说了,但具体到哪个地方和谁我没说。其实,公安部总体政策都是合理的,但下到基层后就变形了。实际上,公安部早就知道这些问题,一些针对这些问题的新制度和法规都要出来了。我简单看了一下公安部正在酝酿中的政策,如果地方和基层都能执行,涉及基层公安部门管理的许多事情将会大大改观。

(下转B03版)